

论聂华苓小说中的离散者形象

陈学芬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省 商丘市 476000)

〔摘要〕 聂华苓小说中的离散者形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形象的转变反映了美籍华人逐渐融入美国, 而美国也由排斥中国人转变到接纳中国人。形象转变的原因有时代大环境的变迁、作家的身份认同、在美国的时间长短及写作语言等。

〔关键词〕 聂华苓; 离散; 美华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156-05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 聂华苓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 水长流》等, 其中《桑青与桃红》“被认为是 20 世纪经典的华文‘离散’书写, 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之中, 并以其‘女性话语方式’在华语文学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位置”。^{[1] (P. 91)} 聂华苓是台湾旅美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 她的小说题材集中于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漂泊状态, 他们对根、对精神家园的渴求, 表达了对母国的思念和批判, 对美国的隔膜与融入。她以冷静、批判的眼光看待中美两个国家、两种文化, 塑造了转变中的离散者形象和异国形象。

离散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 因为“离散是一种千百年来就存在着的人类处境。这种处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处境, 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处境”。^[2] 莫言认为, 那些身处离散之境的作家们, 已经不满足于用含着热泪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母国与家园, 而是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 开阔了视野, 拓展了精神的疆域。“他们的根不在这里, 相对于西方人, 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外来者。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的文化基因来自他们的在亚洲或者非洲的母国, 他们的深层心理

结构和文化记忆来自他们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和心理矛盾, 就促使他们时时刻刻进行着比较。在比较中他们发现了西方的文明和母国的落后, 也发现了西方的虚伪与母国的淳朴。他们其实是永远地处在两种文化的挤压与冲突之中, 由此他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目光。这目光已经不是被单纯的乡愁浸润着的目光, 而是一种冷静的、批判的目光。由此, 他们的创作便呈现出崭新的气象”。^[2]

莫言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离散作家的创作, 而张京媛则从后殖民理论角度阐述了散居族裔的身份认同问题。张京媛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的《前言》中所说“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族裔散居。族裔散居(diaspora)指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用通俗的话讲即是移民现象)。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 生活在所居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 但是他们对其他时空依然残存着集体的记忆, 在想像中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 创造出‘想像的社群’”。^{[3] (P. 6-7)}

离散作家聂华苓塑造了怎样的离散者形象

〔收稿日期〕 2013-06-19

〔作者简介〕 陈学芬(1980-), 女, 河南商丘人,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美华文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李伟昉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文学实证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12BWW006) 的阶段性成果。

呢？作为一个求新求变的作家，她的异国形象有什么发展变化呢？原因何在？让我们先看一下她的代表作《桑青与桃红》。

一、漂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桑青与桃红》塑造了一个到处流浪的，富有反抗精神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桑青。美国移民局的人访问中国移民桑青，桑青说她不是桑青，桑青已经死了。她是桃红，她知道桑青的一切。她自称是开天辟地从山谷里长出来的。桑青的精神分裂，桃红的放浪形骸，让移民局的人摸不着头脑。跋复述了帝女雀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女娃溺死在海里变成帝女雀，飞来飞去，衔石子填海。作者也许以帝女雀隐喻桃红，两者有相似的不屈的反抗精神。桑青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不幸精神分裂了呢？桃红给移民局的四封信以充满挑衅的口吻报告了她流浪的踪迹，她的见闻，并把桑青的日记寄上，这让我们了解到她的遭遇。

文学中的疾病常常是一种隐喻。桑青的精神分裂揭示了人的两面性，隐喻了人与自身、与社会的和谐。旧中国战火不熄，抗日战争之后是国共内战，满目疮痍，到处是一副破败景象。桑青不满母亲的淫荡暴力、父亲的软弱无能造成的阴盛阳衰的家庭气氛，离家出走，准备到重庆抗日，却困在了瞿塘峡，生死未卜，又从南京到了北京，与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成婚。那时全国即将解放，他们预感前途不妙，于是一路南逃，一直逃到台北。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恐怖统治，僵尸吃人案就是一大象征。沈家纲贪污公款后携妻女自我囚禁在阁楼，惶惶不可终日，可以说是腐败的国民政府鱼肉百姓，以致被人民逐出大陆，退守台湾的象征。丈夫死后，桑青独自一人到了美国。然而美国也不是她的天堂，移民局戴墨镜的人让她恐慌，她总是觉得戴墨镜的人在追缉她，让她四处逃窜，躲避移民局的追捕。长期的流浪生涯，长期的恐惧、压抑，让她精神分裂，一会儿是桑青，一会儿是桃红。命运让她一生都在逃难，她最终逃到了疯癫里，并以疯癫来反抗追捕。疯癫的她挑战伦理道德，在精神分裂中获得空前的自由。

桑青可以说是大家闺秀，但她并不是恪守中国传统道德的贞洁的女性形象。她放浪形骸，到

处漫游，自由地享受大自然，享受不为爱情、婚姻约束的性生活。到美国后与有妇之夫江一波有染，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同时与小邓也有性关系。小邓提出与她结婚，一起抚养孩子，回大陆为国家效劳。她拒绝了，她觉得小邓还年轻，不能娶一个死了的女人。她觉得她已经死了，桑青已死，活着的是桃红。一个她要打掉孩子，另一个她要留住孩子。江一波让她打胎，当死了妻子后，庆幸她没有打掉，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她要独自抚养孩子。她似乎并不受传统贞洁观念影响，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受民国时期性解放的时代风潮影响，也许是精神的幻灭，精神分裂，使她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自由地享受性爱。

聂华苓在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新版后记》中说“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人’，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政治，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有些朋友在她的小说中发现与他们处境相似的“人”——流放的、疏离的“人”。即使在自己的乡土上，在自己“家”里，人也可能自我流放、疏离。^{[4] [P. 261-262]}朱立立在《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借用詹姆斯那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这个作品还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5] [P. 67]}并用女性主义来解读桑青和桃红这一分裂的女性人物形象——处于边缘却不甘心受困，反抗和戏弄中外霸权的离散华人女性文化英雄。

这部小说批判了旧中国的腐败，台湾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同时也批判了大陆政权。对美国移民局也颇有微词，他们对待外国人很苛刻，甚至连个人隐私都要讯问，如问桑青是否与蔡先生性交。移民局最终把桑青逼到继续流浪的路上。以美国移民局戴墨镜的人为代表的美国形象冰冷严峻，没有人情味，歧视、压迫中国移民，让中国移民到处漂泊流浪，无法安居乐业。而旧中国则是战乱频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乱世景象。这是对精神家园的重新审视和艺术想象，正如莫言所说“正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异彩的离散文学中所表现的母国与家园，其实大多数都是作者对母国与家园的想象。”小说描述的人物的离散处境具有普遍的人类学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离散之民，

恒定不变的家园已经不存在了，所谓永恒的家园，只是一个幻影，回家，已经是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的家园在想象中，也在我们追寻的道路上”。^[2]

二、混血儿的寻根之旅

《桑青与桃红》中，“行动委员会”的人说：“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人。”^{[4] (P. 216)} 美国移民局的人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地方可递解的外国人。”^{[4] (P. 228)} 无根，才要寻根。施叔青在《摆荡的人》中，安排无根漂泊的游子从美国回台湾寻根，以追求心灵的安宁。白先勇的《夜曲》以是否回国的人的不同际遇彻底否定了回国，而陈若曦在小说《向着太平洋彼岸》中塑造了一个为报效祖国而回国，经历过“文革”的苦难而离国，定居美国后，又准备再次回国的林以贞这个台湾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聂华苓在《千山外，水长流》^[6] 中安排她的主人公到美国寻根，却依然坚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近代以来的中国多灾多难，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内战争就打响了，终于成立了新中国，又政治运动不断，整个社会处于狂热的政治斗争中，人人自危。《千山外，水长流》截取了 20 世纪 4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横断面，把人物的命运与社会政治大背景紧紧交织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彼尔随美国军队来到中国，帮助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了，彼尔回到美国。但他对中国很感兴趣，在 1947 年初再次来到中国，那时正逢国共内战，他做起了记者，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准备研究中国内战时期的学生运动。彼尔与风莲在乱世中相知相恋，他最终选择了风莲，而没有跟随美国同胞贝蒂回国。1949 年 3 月国共和谈，南京学生与军警冲突，彼尔被打伤，住进医院。彼尔在医院与风莲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后死去。因为这一段异国婚姻，风莲母女俩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女儿不理解母亲，母女感情变得冷淡。莲儿出国以后，母女通信，坦诚交流，母女达成谅解。

莲儿到美国后，到父亲的故乡寻根。爷爷老布朗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孙女，而奶奶玛丽因为丧子之痛，迁怒于中国儿媳和孙女，不接受莲儿，对她很严厉，还把她赶出家门。莲儿却在她病时回来照顾她，让她回心转意，全身心地拥

抱莲儿，同时也认可了莲儿的母亲。彼尔是老布朗的外孙，自从莲儿来到这里，他改变了很多，他爱上了莲儿。当初玛丽把莲儿赶出家门，莲儿到离异的林大夫家帮佣。林大夫与一个美国女人的不幸婚姻行将结束，他觉得莲儿是一个能给人幸福的女子。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莲儿还年轻，年龄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面对彼尔和林大夫，莲儿很矛盾，两人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年轻，一个年长；一个血缘太近，一个年纪差别太大。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莲儿是美国布朗家的中国姑娘，有一半美国血统，美国亲人朋友的关怀让她爱上了爸爸的家，但却一再强调“我是中国人”的身份。她深深植根于中国，在异国他乡更认同中国。

三、形象嬗变的原因

从精神裂变的浪子桑青，到带着精神创伤和身份困惑到美国寻亲、寻根，与祖国母亲和解的莲儿，聂华苓笔下的主人公逐步融入美国。而美国也由排斥、打压中国人转变到衷心接纳中国人，总是审查、追捕、递解中国人的带墨镜的移民局官员变成了布朗家的亲人——亲爱的美国爷爷、奶奶和表弟等。在与孙女的近距离接触中，美国奶奶由仇恨中国，拒绝承认莲儿母女的儿媳、孙女的身份，到敞开怀抱，拥抱中国亲人，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由排斥到接纳，作者对美国的态度由憎恶到亲善，中美关系逐步改善。

形象的转变与时代大环境，作家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和在美国的时间长短及写作语言有密切的关系。曹顺庆说“建构他者形象是注视者借以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注视者在建构他者形象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视者与他者相遇时的先见、身份、时间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注视者创建他者形象的基础，决定着他者形象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态。”^{[7] (p183)}

（一）时代大环境变迁

形象的转变与作家生活在美国的时代，作品反映的年代或者说作品中的人物生活的时代有很大关系。时代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政治氛围不同，种族歧视程度不同，美国对华政策及国内的民族政策变化，影响到普通移民及其后裔的生活及他们对美国的感受，由此产生的中国形象和美

国形象也不一样。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建交,美国对华友善,种族歧视减轻,美国日益改善的种族关系为移民提供了较为宽容和自由的生存空间。美国早期实行盎格鲁—撒克逊化政策,把其他族群同化为盎格鲁新教群体;20 世纪初,由于大量的移民涌入,美国政府调整民族政策,致力于把来自不同国家地域、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具有美国核心文化特质的美国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少数民族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反越战,“嬉皮士”等社会事件引发反传统、反主流的思想潮流,强烈冲击了美国的歧视性民族政策体系。在外部和内部压力下,美国政府对民族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使其从“白人至上”到“熔炉”同化,直至当代的“一体”与“多元”的平衡。

桑青形象的塑造与中国政局动荡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桑青与桃红》初版于 1976 年,小说中桑青给移民局写信的时间和地点是 1970 年的美国各地,而附信寄上的日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则是从 1945 年的中国到 1970 年的美国,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民抗日,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聂华苓和家人于 1949 年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导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聂华苓曾任《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1960 年,该杂志被查封,主持人雷震被捕,她失去台湾法商学院教书工作,同外界隔离。1964 年她被迫离开台湾,旅居美国。她中国大陆的故乡流落台湾又漂泊到美国,她的流浪经历让她深切地体味到浪子的悲苦。桑青与她有着相似的遭际,可以说是以她自身为原型而塑造的艺术形象。聂华苓在自传体小说《三生三世》中详细地披露了她的人生遭际和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水长流》等的题材来源、主人公的艺术原型。

《千山外,水长流》初版于 1985 年,那时中国大陆和美国已经由多年的敌对、隔绝而友好建交,台湾的白色恐怖政策也逐渐松动,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逐渐散去。时代、国家的氛围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紧张的氛围产生的是到处追捕中国人的,戴墨镜的,让移民恐慌的移民局官员形象,和到处逃避追捕的无根的中国浪子形象。

宽松的环境产生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相亲相爱的场景。

(二) 身份认同

巴柔在《形象》一文中说“如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中间就涉及到对他者地位及形象的讨论。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8](P.179)因此,形象与身份认同密不可分。

“文化身份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界定自己?‘我’与什么认同?怎样看待‘我’与他者的关系?身份不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后殖主体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己的位置。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P.6-7)

因此,形象的转变与作家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幸福的异族婚姻生活有很大的关系。1965 年移民法之后进入美国的中国新移民,有一部分仍然保持了传统文化及故国身份的认同,成为新一代的侨民。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年岁较大的移民,不同的只是生活环境的变化。台湾旅美作家多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素养,重传统伦理道德,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愫,他们在言说自我与他者时,显示了中华文化遭遇欧美文化的困境。虽然故国不堪回首,聂华苓依然深爱着中国。她的中国认同让她塑造的中美混血儿面对美国人时一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聂华苓在《千山外,水长流》的《附言》中说这本书是献给丈夫保罗·安格尔的。聂华苓与美国人 Paul Engle (安格尔) 相识、相恋,在爱荷华共筑爱巢,幸福的跨国婚姻影响了她的心境,改变了她对美国的看法,于是有了从《桑青与桃红》到《千山外,水长流》的小说基调的改变,从浪子的悲歌到混血儿的寻根之旅,从流浪异乡到把他乡做故乡,由戴墨镜的移民局官员的追捕到美国亲人、朋友的拥抱,她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的转变,塑造了一系列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美好形象。

(三) 在美时间长短

离散者和美国形象的转变与作者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短有关。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形象的塑造者首先是以注视者的身份出现的,作为他者的异国则成为被注视者。观看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观看的方式,这对看到的结果和异国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作为注视者的作者在美国居住的时日越多,他对美国的了解也越深,部分接受美国文化,对美国的好感增加,他的美国形象势必发生变化。移民们与美国人互动增加,双方也越来越了解,更容易融合。

(四) 写作语言

形象的塑造还与写作语言有很大的关系。华文写作的目标读者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如中国人或美籍华人。作家为了销路或为了与读者交流,总是有意无意地考虑潜在读者的接受,这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不同的潜在读者决定了不同的

主题、不同的风格。台湾旅美作家的华文文学的潜在读者是中国人或美籍华人,这让作家主要考虑中文读者的接受心理而不是美国人的心理,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美国人和美国社会,塑造负面的美国形象,而不必担心销路。同时,由于远离中国本土,而不必受制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林润在《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的《导言》中说,美国华文创作不受国内的官方话语、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的束缚,有离散中的自由,属于流放文学一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代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的作家——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陈若曦等写的作品,怀着深厚的民族意识与故国情怀”^{[9] P.6} 聂华苓的离开中国,让她可以自由地表达对两岸政治的批判;她的中文写作,让她可以不必在乎美国英语读者的感受而自由地表达对美国的看法。

(参考文献)

- (1) 乔以钢,刘堃.论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中“离散”内涵的演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 91.
- (2) 莫言.离散与文学[EB/OL].<http://news.gznu.edu.cn/info/1013/4464.htm>,2013-5-9.
- (3)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7.
- (4) [美]聂华苓.桑青与桃红[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261—262,216,228.
- (5) 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7.
- (6) [美]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7)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83.
- (8)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79.
- (9) 林润.导言:有关美国的华文文学[A].林润.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6.

On Images of Diaspora in Nie Hualing's Novels

CHEN Xue-f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476000)

[Abstract] The images of Diaspora changed a lot in Nie Hualing's novels from Sang Qing and Tao Hong who were prodigals of spiritual fission to Lian Er who suffered from trauma and identity confusion and went to the U. S. seeking relatives and roots and reconciling with her Chinese mother. This change of images shows that Chinese Americans were gradually assimila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accept Chinese instead of rejecting them. This change results from the changes of time, writer's identity, the length of the tim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riting language.

[Key words] Nie Hualing; Diaspora;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宝玉柱)